

科学社会主义
活頁参考资料

(2)

校 内 用 书

科学社会主义系资料室

197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65,000 册数：1,700

统一书号：3011·133

定 价：0.32元

《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杜林体系的斗争史略》是苏联1962年出版的《近代德国工人运动（论文和资料汇编）》一书中的一篇文章，其中引证了不少资料，对于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同杜林斗争的历史背景，批判杜林的思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位哲学家》，是莫斯特通过向读者推荐杜林的《哲学教程》一书，大肆吹捧杜林主义的一篇反马克思主义的毒草，其中大量引用了杜林的言论。在研读革命导师恩格斯的光辉著作《反杜林论》时，这篇文章可作反面材料参考。

约翰·莫斯特（Joham Most 1846—1906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在理论上是杜林主义的推崇者和狂热鼓吹者，公开反对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在政治上是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1878年，俾斯麦实施《非常法令》后，莫斯特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提出了一些极“左”的口号，大搞无政府主义和分裂党的活动。因此，该党在1880年维登代表大会上，宣布开除莫斯特等出党。

目 录

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杜林体系的

斗争史略·····	A. Б. 切尔诺夫(1)
一位哲学家·····	约·莫斯特(41)

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杜林 体系的斗争史略

A · B · 切尔诺夫

巴黎公社失败和第一国际解散后，资产阶级反动派变本加厉地向工人阶级进攻，力图不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而且在思想上制服它。为了在思想上制服工人运动，资产阶级反动派利用了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从那时起转移到了德国，在这里，阶级斗争在七十年代达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拼命想把工人运动引上改良主义的轨道。例如，德国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1872年就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一组标题为《住宅问题》的文章。恩格斯在1872—1873年发表的《论住宅问题》这部名著中，对蒲鲁东主义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1873年，几乎与米尔柏格发表文章同时，柏林大学讲师欧根·杜林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一书，这是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的大杂烩。该书受到了资产阶级报刊的热烈欢迎，并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也获得了拥护者，虽然它有明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性。党内有人开始公开宣传杜林的观点，请他为社会主义杂志撰稿。一个人数不多、但却有影响的杜林分子集团，力图把杜林的观点强加于

党，把党推上机会主义道路。直到1877—1878年恩格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组标题为《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文章，才使党获得了清除杜林影响的武器。

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杜林体系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中公开与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派斗争的一个阶段。本文的目的是要根据未发表过的档案文件和资料^①，就引证的史料提供的可能性，尽量完整地恢复反对杜林体系的斗争的历史、从思想上粉碎杜林体系的历史的本来面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部卓越的著作，对于从思想上粉碎杜林体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注意到杜林，是由于杜林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马克思的这一天才著作1867年问世时，德国官方经济学代表人物制造了一个对它沉默抵制的阴谋。杜林是第一个著文评论马克思的这本书的经济学家^②。马克思当时就指出，杜林并没有觉察到《资本论》的基本观点的崭新因

① 本文利用了下列资料：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以及他们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活动家之间的通信，1876年和1877年两次党代表大会的记录，社会民主党中央报刊和部分地方报刊以及回忆录。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威·李卜克内西、白拉克、布洛斯等人）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这个问题的通信，对于恢复同杜林斗争的历史的本来面貌，是重要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唯一的史料，这些通信现在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内。

② 杜林的评论载于迈耶尔词典附刊（《现代知识补充材料》1867年第3卷第3期）。

素①。恩格斯称他是“庸俗经济学家”②。马克思读了他的其他一些著作后，对他的评论就很不客气了。马克思写道：“这是一个极为傲慢无礼的家伙，他俨然以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者自居”③。

1871年，杜林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一书，书中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了粗暴的和疯狂的攻击，并且故意歪曲它的基本论点。《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也是如此。对此恩格斯写道：杜林在1867年“还能够作出对他那类思想家来说算是比较合理的该书的内容提要，还不急需一开头就把马克思的论述翻译成杜林的东西，而现在他声明非这样做不可了”④。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1月8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1页。

②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8年1月7日）》，见同上书第8页。

③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3月6日）》，见同上书第525页。

④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同上书第20卷第135页。我们且看杜林的一个手法。他在《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中写道：“如果同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一起设想，首先对小企业的剥削和吮吸应当继续许多世纪并达到极端的程度，然后自然而然地会发生突变——剥夺剥夺者，那就不该向群众隐瞒这种奥妙的想法。然而不能不感到，一方面直接激起欲望和希望，另一方面又认为达到目的和人的努力毫无关系，把这些努力推迟到遥远的世代，那是违背常识的。”（欧根·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圣彼得堡1893年版第311页）这样，杜林为了糟蹋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的最重要结论，先把马克思说成是（我们且用后出现的术语来说）资本主义自行崩溃论者，然后扬扬得意地宣称，他臆造出来的这种自行崩溃论同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必然性的学说之间存在“矛盾”。

起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杜林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并不特别在意，那些言论和资产阶级学者其他类似的言论没有多大的差别。

但是从七十年代初起，特别是在《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出版后，杜林的名声开始猛增。而且，他不仅是作为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书立说者而出名的^①。杜林还发表物理、化学和天文学方面的著作。他的《力学一般原则批判史》1872年在哥丁根大学应征获得头奖。杜林在柏林大学讲授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大受欢迎，而且不只是在大学生当中。

杜林从事著述和讲学活动，一开始就极其自负。他大言不惭地一笔勾销了他以前的全部科学，自封为几乎精通所有科学领域的唯一行家。他把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方面的理论说成是终极的真理。

实际上，杜林的理论著作并没有任何独特的东西。他的哲学是实证主义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福格特的庸俗唯物主义和被误解与歪曲了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折中混合物。杜林任意对待辩证法规律，用抽象的辩证法偷换具体的辩证法，或者索性宣布辩证法是荒谬的东西。恩格斯在评论杜林的哲学时写道：“在哲学上，当他不是简简单单地胡说八道的时候（象在自然哲学中那样），他的观点是对十八世纪的观点的歪曲。”^②

在社会观点方面，杜林没有超出十八世纪启蒙主张摹仿者

① 这一时期，除了上述一些书籍外，杜林还出版了：《自然辩证法》（1865年），《凯里在国民经济学说和社会科学中实行的变革》（1865年），《生命的价值》（1865年），《资本和劳动》（1865年），《国民经济学说批判基础》（1866年）和《哲学批判史》（1869年）。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5页。

的水平。他复活了旧的资产阶级暴力理论，根据那种理论，不平等、财产、阶级的产生，是直接的暴力，即无法解释的主观因素的行为的结果。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制定了唯物史观，到了这个时候还去宣传那种唯心主义的理论，就给工人运动造成很大的危害，因为那种理论歪曲了经济和政治的真正的相互关系，妨碍对社会生活规律的正确理解，用空洞的道德说教偷换阶级斗争。

杜林的另一个理论，即所谓“个人主权”的理论，对于树立工人阶级正确的革命的世界观，也产生同样的坏影响。根据这种理论，从两个人的相互关系的模式中推论出个人的自主或独立，然后把所得的结论机械地引伸到整个社会。杜林大谈其抽象的，丧失阶级属性的人，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抹杀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质和引诱工人不去思考革命斗争的问题。杜林的暴力论、“个人主权”论以及其他理论，同拉萨尔主义一起，阻碍了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的斗争。

在杜林的著作中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论点，如用唯心主义观点解释杰出人物和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宣扬复仇理论是法的基础，承认个人恐怖等等。正是这些论点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个别代表人物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的无政府主义策略的一种思想基础。

杜林宣称，他的“共同社会”理论比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在内的现有的一切社会主义理论都优越，而实际上他并没有任何独特的见解。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他是那种“放肆的假科学”的典型代表之一，这种假科学“很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嚣声中”^①。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8—9页。

但是，杜林是在德国大学生开始转向社会民主主义方面这一时期^①，开展自己的宣传的。这一时期，用梅林的话来说，

“任何一个表示愿意效劳并且奉献出某种治疗社会恶疾的药方的人都被欣然接纳，而从学院里潮涌而来的那批人尤其受到欢迎——因为这有利于加强无产阶级和科学的联盟。一位大学教授，如果他按照对于‘社会主义’的多种多样的理解中的任何一种来向社会主义靠拢，或者表示希望靠拢，他就不必担心他所兜售的知识货色会受到过分严厉的批评”^②。杜林到处把自己打扮成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改革家。一个学术界人士维护社会主义，单是这件事本身，就引起对杜林的极大注意。

杜林发表维护巴黎公社活动家的言论，自然博得德国先进舆论界的好感。在普鲁士警察制度的条件下，杜林对“压迫的”国家所说的激进言词，使他获得了争取德国国家制度民主化的斗士的名声。

但是，尽管在杜林的激进辞藻背后多半隐藏着反动的观念^③，正是这种激进辞藻使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思想上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页。

② 梅林《马克思传》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631页。

③ 例如，杜林在《哲学教程》中写道：“暴力的和压迫的国家同崇高的人道精神是不相容的，新的变革就是要建立新社会以取而代之。”（杜林《哲学教程》莱比锡1875年版第301页）除了这类含糊其词的空话以外，杜林再也说不出别的了。而再过几页之后，在讨论建立新社会的途径时，杜林竟说道：“这样一些结构可以逐步地挤进压迫的国家的框框里面去，这些结构不仅对于这种国家来说将成为致命的东西，而且将为自由社会准备良好的基础。”（第308页）虽然马克思已经阐明了打碎国家机器的必要性，杜林却还在说自由社会不是经过消灭“压迫的国家”，反而是在这种国家的范围内建立起来的。杜林的国家观，以及哥达纲领关于所谓的“自由国家”的条文，都阻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树立正确的国家观。

不坚定和理论上不成熟的代表人物眼里成了一个领袖。爱·伯恩斯坦、约·莫斯特和弗·弗里茨舍成了社会民主党内最狂热的杜林拥护者。从1872年起，伯恩斯坦就是最先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当中积极宣传杜林的一个。

倍倍尔在1898年描述过伯恩斯坦的为人，下面这段话很能说明他的思想面貌：“……将近三十年来，我们彼此都了解，你屡次为各种各样的印象和影响所左右，急剧地改变自己的观点……你加入了爱森纳赫党。过了几年，你受杜林的著作和讲课的影响而成了热忱的杜林分子。后来你认识了赫希柏格，并受到他的影响”①。正是思想上的极端不坚定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接触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一书，伯恩斯坦就“心移神往”②，看到《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他就“欣喜若狂”③。

后来伯恩斯坦自己承认，他替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所作的宣传，比任何人都多④。正是他把这本书寄给了倍倍尔、白拉克、莫斯特、弗里茨舍等人⑤。1874年，他认识了杜林，在初次拜访时就提出请求，要杜林在大学开课讲授与社会主义有关的问题时，把课改在职工听讲方便的时间。而且，正象他在回忆录里所说的，“几乎所有或多或少受杜林影响的有名的同志，如倍倍尔、弗里茨舍、格罗特考、洛

① 维·阿德勒《同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卡尔·考茨基的通信》维也纳1954年版第256页。

② 爱·伯恩斯坦《童年和青年。1850—1872》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版第187页。

③ 《新时代》1894—1895年第1卷第103页。

④ 同上。

⑤ 古·迈耶尔《恩格斯传》海牙1934年版第2卷第282页。

骚、米耳克、莫斯特等人……都被吸引去听杜林讲课”①。

这一时期，甚至爱森纳赫派的领袖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也一度受到杜林的影响。

1872年夏天，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因为在帝国国会上勇敢抗议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发言维护巴黎公社，一起被取消国会议员资格，并以“叛国”的罪名被判处监禁两年。倍倍尔利用了在狱中的时间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斯图亚特·穆勒、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莫尔、达尔文、海克尔、毕希纳等人的著作②。他在狱中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仔细阅读了两遍。1873年夏天，伯恩施坦到狱中探望倍倍尔，给了他一本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③。虽然倍倍尔当时已经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但他还不能马上独立地识别杜林所写的东西的反动实质。而且，正象后来李卜克内西告诉恩格斯的那样，倍倍尔“根本不知道”杜林对马克思进行了攻击④。他受了杜林的假革命词句的欺骗，在书中看到的首先是作者“猛烈抨击社会现状并表示拥护共产主义”⑤。1874年初，倍倍尔就是在监狱里写了一篇颂扬杜林这本书的文章（虽然附了一些批评意见），把它寄给了爱

① 爱·伯恩施坦《社会民主党的学习年代。1872—1888年》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版第52页。

② 格·文德尔《奥古斯特·倍倍尔》，彼得格勒—莫斯科1924年版第47页。

③ 爱·伯恩施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 展过程》莱比锡1930年版第10页。

④ 《威·李卜克内西致恩格斯（1875年10月25日）》，见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以下简称“档案”。——编者）

⑤ 倍倍尔《我的一生》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卷第317页。

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

倍倍尔在这篇文章中断言，杜林“对今天的国家、议会主义的本质、国家权力的党派特性、巴黎公社等的评价”，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看法完全一致。文章的结尾这样说：“我们对杜林的著作提出的这些异议并不涉及他的基本观点。我们认为他的基本观点是无可指责的，表示完全赞同。我们毫不犹豫地宣布，继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杜林的新著作属于经济学领域最近出现的优秀作品之列。因此，我们热情地推荐他这本书。”①

关于这篇文章，李卜克内西曾写信向倍倍尔指出，“马克思的方法和杜林的方法之间有重大的区别”②。但是，在3月份的《人民国家报》上，这篇文章却以《一个新的共产党人》为题匿名发表了。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出现这篇文章，自然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极大愤慨，这说明报纸编辑部根本不了解杜林理论的危害性。但是主要的危险在于，报纸向广大的无产阶级读者推荐杜林的著作③。果然，正如《人民国家报》的一个编辑威·布洛斯后来指出的，倍倍尔的文章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当中引起了对杜林的很大兴趣④。

布洛斯在1874年5月27日告诉恩格斯，文章出自倍倍尔的手笔，在这以前，恩格斯不知道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布洛斯写信给恩格斯时替自己发表这篇文章辩护说：“我自己只是粗略地翻阅了一下杜林的书。但是由于柏林的党内同志，包括议员

① 《人民国家报》1874年3月20日。

② 爱·伯恩斯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的发展过程》第10页。

③ 见《人民国家报》1874年3月20日。

④ 威·布洛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录》慕尼黑1914年版第1卷第233页。

们都赞扬他，去听他讲课，因此我想，既然迄今常常颂扬雅科比，也就不应对杜林评价不足。李卜克内西也表示了这种意思，于是，我就刊登了这篇文章。^①”从这封信清楚地看到，倍倍尔的这篇文章不仅表达了作者本人的意见，而且也合乎柏林社会民主党组织和《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某些领导人的情绪。

起初，社会民主党人当中没有一声反对的意见。相反，布洛斯不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在上述信件中断言，这篇文章“没有任何崇拜的意思，而只是“很平常地承认功绩而已”^②。

《人民国家报》主编李卜克内西1874年6月13日写信问恩格斯：

“你是否有根据认为此人是个无赖或暗藏的敌人呢？我所了解的关于他的情况，使我深信，他虽然有些糊涂，但是十分诚实，并且坚决站在我们这一边。”他接着又说，倍倍尔的这篇文章“并不是完全正确和令人太高兴的，不过，总的说来无疑还是好的”^③。

鉴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对杜林的观念抱这种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4年6—7月写信给李卜克内西、布洛斯和赫普纳，指出杜林体系在党内的危险性^④。

只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坚持不懈的解释，也由于杜林在党内的影响不断增长，李卜克内西才逐渐地最终认识到必

①② 《威·布洛斯致弗·恩格斯（1874年5月27日）》，见“档案”。

③ 《威·李卜克内西致弗·恩格斯（1874年6月13日）》，引自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柏林1956年版第VI页，见“档案”（另见《威·李卜克内西与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通信集》海牙1963年版第190页。——译者）

④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864页。

須批判杜林的理论。1875年2月1日，李卜克内西给恩格斯写信说道：“你是否愿意写篇文章（严厉地）清算杜林？他在他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第二版中重复了他对马克思充满忌恨的全部愚蠢謬言。我在圣诞节前听了此人的一次讲课。疯狂自大，咬牙切齿地忌妒马克思，无非是这类货色。他在我们许多人当中（特别是在柏林）影响很深，必须彻底收拾他。”①

但是，尽管说得这么坚决，正好是一个月后，1875年3月2日，李卜克内西却在《人民国家报》上辟出篇幅转载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第二版关于巴黎公社的段落，而该书的这一版，正如对摘录加的按语所说的，不仅“没有摆脱第一版的主要缺点”②，而且更放肆地谩骂马克思，故意歪曲马克思的观点。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转载杜林书中的这些段落，意味着党接受了他的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被激怒了。李卜克内西为了替自己辩解，只好推说在转载关于公社的部分时，《人民国家报》“特意指出了杜林的错误”③。这样的回答自然不能使恩格斯满意。

实际上，李卜克内西这种首尾不一贯的行为是杜林在党内的影响增长的反映。在爱森纳赫派同拉萨尔派于1875年5月合并之后，杜林的影响尤其增长了。合并时通过的纲领，是马克思之前的教条，特别是拉萨尔的教条，庸俗民主主义原则和被

① 《威·李卜克内西致弗·恩格斯（1875年2月1日）》，见“档案”（又见《威·李卜克内西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通信集》阿森1973年版第593页。——译者）

② 《人民国家报》1875年3月2日。

③ 《威·李卜克内西致弗·恩格斯（1875年4月21日）》，引自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柏林1956年版第Ⅶ页，又见“档案”。

完全歪曲了的共产主义要求的混合物，这个纲领证明对极重要的理论问题缺乏正确的理解。在哥达实行的思想上的妥协，不可能不反映在党的发展上。正是在党的领导人当中和报刊上，机会主义开始泛滥起来。马克思对此说道：“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①。

党内思想上的摇摆的加剧和拉萨尔主义（管杜林冠冕堂皇地攻击拉萨尔，他在某些问题上接近拉萨尔主义的）的影响的加强，助长了杜林体系在社会民主党内思想不坚定的分子当中的传播。杜林的拥护者力图把杜林的观点强加于全党。伯恩施坦后来直言不讳地写道：当时许多党员“开始通过杜林的批判眼光去评判马克思和拉萨尔的学说的原理”②。

杜林本人也鼓励这种做法，他在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些拥护者同他保持友好联系。例如，在1874年伯恩施坦初次拜访他时，他就说过他“很高兴有很多党员听我讲课”③。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杜林分子力图首先把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变为宣扬杜林观点的讲台。杜林分子抓住李卜克内西不够坚定这个弱点，指责他专横和压制批评，要求他发表宣扬杜林著作的文章。

①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1877年10月19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1页。

② 《新时代》1894—1895年第1卷第105页。

③ 爱·伯恩施坦《社会民主党的学习年代》俄文版第52页。